

朱晓进◎著

政治文化与

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从政治文化这一角度来探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现象，旨在揭示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深入分析，本书试图还原文学创作的复杂语境，探讨文学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承担起启蒙、救亡和批判的社会功能。

本书的研究方法注重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的结合。通过对鲁迅、茅盾、老舍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进行细致分析，揭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内涵。同时，本书还广泛参考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潮以及文学理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的多元面貌。

本书适合文学研究者、文化学者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它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批判之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朱晓进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1

ISBN 7-01-005937-3

I. 政… II. 朱… III. 政治-文化-关系-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1927~1936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0974 号

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ZHENZHIWENHUA YU ZHONGGUO ERSHISHIJI SANSHI NIANDAI WENXUE

作 者: 朱晓进 著

责任编辑: 林敏

装帧设计: 鼎盛怡园设计室

版式设计: 鼎盛怡园设计室

出 版: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1.25

书 号: ISBN 7-01-005937-3

定 价: 29.00 元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010) 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朱晓进

朱晓进，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独立承担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和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已出版《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鲁迅文学观综论》、《“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找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等学术专著6部；主编出版教材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社科联优秀论文一等奖、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多项奖励。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全国高校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目 录

引 论	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	(1)
第一章	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氛围 ………	(14)
第一节	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 ……………	(14)
第二节	三十年代政治文化环境下的文学 氛围 ……………	(26)
第三节	特殊政治文化语境对文学的影响 ……	(39)
第二章	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 ………	(52)
第一节	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	(52)
第二节	左翼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 性质 ……………	(58)
第三节	“新月派”：依据政治立场定位的文学 策略 ……………	(68)
第四节	“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自由”	

背后的政治文化意识	(86)
第五节 远离政治：“京派”作家针对政治的 一种文学姿态	(101)
第三章 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特征 ...	(118)
第一节 在政治层面上对话的文学论争和文学 批评	(118)
第二节 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角度	(133)
第三节 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化 思维	(156)
第四节 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文学论争和文学 批评	(177)
第四章 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文学的导向	(194)
第一节 政治文化心理导致的特殊的阅读 需求	(194)
第二节 政治化阅读需求对创作和办刊的导向 作用	(208)
第三节 政治化阅读和创作对文学出版构成的 制约	(221)

第五章	政治文化与作家的文学选择	(232)
第一节	作家思想意识的政治化趋向	(232)
第二节	作家的政治诉求与创作题材的选择.....	(240)
第三节	受制于政治价值观的处理题材的角度与 方式	(257)
第六章	政治文化与三十年代独特的文学风尚 ...	(267)
第一节	文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	(267)
第二节	政治激情与文学创作	(285)
第三节	“集团化”倾向与文坛的 “公式主义”	(307)
第四节	政治文化语境与特殊文学文体 的盛行	(321)
	主要参考书目	(344)
	后 记	(347)

引 论

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27 - 1936）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对这个时段文学进行研究时，我们所采取的切入角度和所采用的方法也应该是独特的。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人们似乎总有着这样一种强烈的主观冲动：总希望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或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找到一个统一的角度。人们为此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不同时代的文学各有其自身独特的特征，要想用统一的角度来统概不同时代的文学，即使不是徒劳无功，起码也会是常常以牺牲一些时代的文学的独特性为其代价。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应该是多元的，使用何种角度，关键要看这种角度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对三十年代文学进行研究，要使研究的切入角度和所采用的方法与该时段文学相契合，我们对该时段文学的特殊性就应该予以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三十年代文学确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且由于这“特殊性”，使这一阶段的文学具有了某种独特的“敏感性”：建国后再版的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中，三十年代的作品占了绝对的比重，这除了三十年代文学相对而言是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成熟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五六十年代文艺对“政治性”的异常强调，使出版者、编辑者们更容易将眼光伸向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三十年代文学。同样是三十年代文学，在“文革”期间遭到的否定也是超出其他任何阶段的文学的，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其座谈会《纪要》中也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黑线”的源头定位在“三十年代文艺”上。周扬在八十年代曾发过这样的感慨：“‘三十年代’这个历史概念，长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歪曲和诽谤”，使得“人们竟把‘三十年代’看成一个不光彩的名称。”而“台湾反动分子至今还在咒骂‘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把它称为‘幽灵’”。^①毫无疑问，“三十年代”文学与文艺之所以会如此成为“敏感”的问题，盖源于它自身的政治特性。

三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文学政治化的源头，茅盾曾说过，他写于三十年代的《林家铺子》六十年代被改编成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现在翻翻三十年代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

^① 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人民日报》1980年4月2日。

的某些评论，又回想当年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觉得两者之间的观点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① 这里，茅盾指出了三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及其后的年代在以政治批评代替艺术批评方面的相似之处。而茅盾所谓的不同之处在于：三十年代文学批评虽与政治紧密相关，但尚未与“政权”连接；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却是与政权相连接的；所以作家对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可以“不把它放在心上”（当然，也并非完全如此），而对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却不敢“不把它放在心上”。可见，文学的政治化，三十年代与其后的年代是一脉相传的，这更说明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是一个必须给以充分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特殊关系。三十年代许多重要文学作品都明显表露出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同时隐含着一种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它广泛涉及不同的党派、社群乃至个人的政治意愿，并以此为中介，影响和制约着三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研究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范围来探讨三十年代诸多文学现象的成因，可以从更为本质的方面来揭示三十年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并有可能将三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145页。

十年代的文学研究引向深入。

从三十年代的特殊性出发，由这个阶段文学在总体上的明显的政治性特征所决定，我们选择从政治文化这一角度来观照文学，其目的无非是想能多少看出一些从其他角度所难以看出来的问题，多少揭示出其他角度所难以揭示的更为接近该时段文学本质的特征，多少得出一些从其他角度难以得出的某些结论。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其他角度的有效性，因为，在观照某个具体事物时，是可以有多个视角的。不过，观照任何一个对象，事实上都可能只有一个最佳视角，舍弃了这种最佳视角，所观照的对象难免失真。就三十年代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产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三十年代各种文学现象、作品作出合理的评价。

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学，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我们的研究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历时已经是很久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曾出现过两种倾向，或是过分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常常出现以政治情绪化评判取代客观的文学研究的情况；或是有意无意忽略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也难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客观的历史评判。要避免上述走极端的研究倾向，就必须真实客观地来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以往学术界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最大的失误是并未真正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方式。人们虽然是明确意识到了政治维度，并试图加以描述，但在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方式之前，

这种描述只能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将文学的内容与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而很少有人真正客观地去探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是构成了文学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政治与文艺之间关系的历史深度仿佛在一块二维屏幕上被压扁了，一切都满足于在朦胧状态中被描述、被概括。这样所导致的后果是，要不就是在主观的想象中强化政治的作用；要不就是在盲目的臆测中否认政治对于文学事实上所起的作用，二极对立观点的构成其实都源于一种朦胧。事实上，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只能是历史地、具体地、阶段性地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文学史的研究正应该去历史地、具体地加以探究，以便揭开这种关系之上的朦胧面纱。在这里，我们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无非是尝试着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条关系方式的桥梁。

二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时首先创用的。按照阿尔蒙德的 understanding，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

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的观念中，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六十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纷纷采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的趋向。当然，在具体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异的。1958年，比尔（Samuel H. Beer）和鄂曼（Adam Ulam）在出版的《政府的模式：欧洲主要政治体系》一书中所讲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政治价值、信仰体系、感情态度与符号。196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尤劳（Heinz Eulan）在其《政治学行为派》一书中肯定了“政治文化”概念的价值，认为它可以促进政治行为的研究，以比较不同文化体系或同一文化体系内“各次级文化”间的异同。1965年白鲁恂（Lucian W. Pye）与弗巴（S. Verba）合编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一书，白鲁恂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套态度、信仰与感情，此种态度、信仰与情感使政治过程有秩序及意义，同时为政治体系设下了基本前提与规则，以求控制体系中的行为；”而弗巴则认为，“政治文化是由包括经验性的信仰、表达的符号以及价值判断三者所交织的体系。它划定政治行为发生的背景，是政治活动的主观取向，包括一个政治体系的最高远的理想以及一般的行为规范。”^① 1966年，阿尔蒙德与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 Jr）合作发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一

^① 参见《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英文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书，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涵义和定义作了进一步阐发和界定，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之中。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①

上述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种种阐释，包含着不同的研究者自身对此的理解以及标明了他们各自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在此，我们并无意于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作更为具体的研究甚至解释，因为“政治文化”目前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相对宽泛的学术领域。按照我们的理解，“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我们在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是基于我们对此的上述理解来使用的，而且，在我们研究政治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更

^① [美]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主要地是在狭义上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而作为研究背景，广义的政治文化内容也有所涉猎）。

我们关注“政治文化”问题，首先是因为“政治文化”这一问题所涉猎的重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这一概念。按照以往我们通常对“政治”的解释，政治就是指“阶级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另一解释，有时就是直接“指国事”。^①我们从上述对“政治”的解释中所能领略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活动”，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等等主观取向却无法得到强调。这样，当我们谈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时，势必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客观“活动”的“政治”是如何与个人性、主观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相关联的。马克思曾这样批评过机械唯物论的片面性，说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我们认为，在以往的政治与文化关系研究中所最常见的诸如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等弊病也与此有关。而“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

^① 参见《辞海》（语词分册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1页。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且包括甚至主要关注的是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等。这对我们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确实是提供了绝佳的中介。

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活动，但最终“政治”进入“文学创作”活动乃至最终影响文学作品等等，却只能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个通道来完成的。“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于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治文化”是我们所试图找寻的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当然，我们关注“政治文化”问题，还因为“政治文化”这一问题本身所包孕的丰富的内蕴，这不仅是指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必将会丰富我们对诸多政治与文学现象的解释语汇，而且是指与之相关的诸多的分析方法和方式，也将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诸多的启示。

三

我们研究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因此，我们在涉及政治文化时，所关注的

也只是与三十年代文学相关的部分，而并非讨论三十年代政治文化的全体部分。而且，我们在涉及那些相关的政治文化部分时，也绝不是对之作单独的陈述或探究，而是将之摆到与文学的关系中来加以探讨，即看它对文学的影响程度，它在文学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只有与三十年代文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探讨政治文化之于三十年代文学的关系时，“政治”或“政治文化”并不是我们评价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标准或依据，我们不是从某种“政治”的要求去评价文学的得失，而只是以此作为我们观照文学的一个“角度”。

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尽可能地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文学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尽可能地以翔实准确的史料去研究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控制、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并由此来认识各派文学对此的实际反应以及所采取的不同的文学策略，即通过对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的揭示，以期找到三十年代许多文学现象（包括作家行为、作品特征、重要的文学论争、文学派别、文学范型、文体现象的形成等等）的重要依据，以达到对三十年代文学的准确把握和全面而中肯的评价。

我们的研究是具体从这样一些方面入手的：

首先，我们努力揭示了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氛围。谈三十年代文学，绝对离不开三十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氛围。我们通常文学史意义上的“三十年代”，是以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权的建立